

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 评估与预测 (1955—1967)

詹 欣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从 1955 年中国开始决定研制核武器, 到 1967 年成功进行氢弹试验, 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核装料发生明显的误判, 也低估了中国在热核武器上的能力, 但从整体上基本勾勒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全貌。

关键词: 中央情报局; 核武器; 国家情报评估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79(2007)03-0019-06

冷战时期, 有关中国的军事实力一直是美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议题。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一时期做出了大量的评估报告, 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情报评估(NI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 从 1960 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每年都对中国的战略性武器计划进行评估, 这些文件构成了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国战略性武器计划的基本认识、评判和预测, 也为总统制订决策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性文件。^①

中国核武器^②计划作为战略性武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美国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近些年随着国家安全档案的解密, 有关这一议题的学术性专著和论文逐渐增多, 但是它们大多集中探讨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首次核试验的评估与对策。^③实际上从 1955 年 1 月中国开始制订核武器研制计划, 到 1967 年 6 月 27 日成功进行氢弹试验, 短短的十二年里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却颇为薄弱。本文仅从美国情报部门的角度, 利用已公开的原始档案, 探讨它们是如何对中国核武器计划进行评估的, 比较与实际进程的差异, 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

一、中国核武器计划的缘起与苏联的援助

中国的核工业始于 1955 年初。1955 年 1 月 15

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听取了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和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 研究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说道: “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 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这时候了, 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 认真抓一下, 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 我们一定要搞好! 我们自己干, 也一定能干好! 我们只要有人, 又有资源, 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会后通过了代号为 02 的核武器研制计划。^{[1](p.11)[2](pp.42-43)]}从 1955 年到 1958 年, 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 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六项协定, 援助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

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关注由来已久, 也敏感地注意到苏联在核领域对中国的援助。早在 1950 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在核技术上的动向, 不过在当时他们认为中共缺少资金、设备以及工艺技术来独立地开发原子能计划, 甚至在核科学领域进行重大的研究。^[3]然而随着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协定书》的签订, 美国情报部门对此事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4 月 27 日中苏签订《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 苏联宣布以“成本价”帮

收稿日期: 2007-01-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13)

作者简介: 詹欣(1971—), 男, 江苏扬州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 6500 千瓦的原子能反应堆，并为处理放射性物质许诺赠送一台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室。情报部门判定北京出于政治声望的目的，可能会进行适当的核研究计划。

中国发展核工业在当时首先是用于军事目的。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该协定标志着苏联的援助从核物理科学研究过渡到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制技术上来。^{[4] (p. 623) [1] (p. 21)} 关于苏联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对中国的援助，在当时是极为敏感的事情，没有一份评估报告能够准确地估计苏联到底给予中国哪些实际上的援助，但是考虑到中苏同盟的关系，他们大都认为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极为重要。当然情报部门也清楚地看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认为苏联在提供援助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步骤，以尽量阻止中国掌握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在预测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的时间上，情报部门认为这取决于苏联实际援助的程度。如果苏联提供放射性材料，并帮助设计和组装核装置，那么中国可以在最近的任何时间制造出一个核装置；如果苏联在核领域的援助由于中苏分歧而减少，那么进展将大大减缓。^{[5] (c. 287—313)}

不过中国早在与苏联签订六个协定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设，把学习与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建设实践中学习苏联提供的技术和经验。^{[1] (p. 22)} 当然情报部门也发现中国在通过谈判、签订有关正式协议，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明显地保持了相当的自主权。^{[5] (c. 287—313)}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将于 7 月 28 日到 9 月 1 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情报部门判定苏联对中国核能计划援助的缩减将极大地阻碍中国成为核大国的进程。^{[5] (c. 287—313)} 而事实上确实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与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并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中国留下了一批半截子工程，中国的核工业面临极大的困难。

有关这一时期苏联援助与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专家们。首先，在时间上情报部门对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评估大大滞后了。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始于 1950 年代中期，但是直到 1960 年末美国才公布了第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国家情报评估，而这时苏联已经开始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了。虽说在内容上有大

量对苏联援助的评价，但是大多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其次，情报部门在苏联援助中国核武器计划的种类和数量上，一直不能得到充足的情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大多通过中苏之间的互相指责，寻找出蛛丝马迹。因此他们只能猜测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要比其他类型的军事援助更加谨慎，到 1960 年代中期这种援助将会实质上地减少甚至会中止，但是具体情况则很难说清楚，不得不大量依赖于其他计划的情报和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来进行推断。^[6]

二、中国核技术的开发与第一次核试验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美国情报部门在判断中国核技术开发时，首先关注的是其铀矿的开采，他们在 1960 年代初的几份国家情报评估中都用了相当的篇幅分析中国的铀矿。1960 年在其中的一份评估中认为中国当时有 10 个以上的开采点处于工作中，并预测每年能够开采、储存几百吨含有金属铀的矿石。^{[5] (c. 287—313)} 1963 年 8 月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国家卫星照片分析中心还专门对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铀矿进行了侦察，并发现了两处令人怀疑的地点，估计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共开采 3 万至 4 万公吨的铀矿。^{[7] (c. 175)} 而事实上在 1955 年，中国地质工作者就发现了一大批放射性异常点，其中可进行勘探的 11 处，到 1960 年先后提供开采基地 8 个，基本满足第一批铀矿山建设的需要。^{[1] (p. 22)}

不过情报部门对中国原子弹的核装料一直迷惑不解。一般说来，制造原子弹可使用两种核装料进行核爆炸，一种方法是通过浓缩铀，提高铀同位素铀—235 对铀—238 的比重；另一种方法是用二氧化铀作为钚生产反应堆的燃料生产钚。从技术上讲，制取钚要比制取高浓缩铀—235 容易些，美国 and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使用的是钚。因此他们在评估中国的核装料时，首先认为中国会选择钚作为核装料，即使看到大量铀—235 的证据，仍坚持认为铀—235 是为生产钚而进行准备的。1960 年的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在铀资源开发、可能进行的矿石浓缩和金属铀提炼厂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判断他们可能在生产钚时使用铀。他们估计在 1961 年末第一座中国制造的反应堆将会达到临界状态，第一个钚反应堆有可能在 1962 年末建成；而正在建设的铀—235 工厂由于开发工作庞大以及需要建设一个气体扩散厂，因此判定中国在 1962 年末之前

不可能制造出高浓缩的铀—235。^{[5] (c. 287—313)}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但是仍旧认为钚是核武器的首选材料。他们认为在苏联撤走技术人员以前，中国已建造了一座天然铀金属回收工厂，如果该工厂进展顺利的话，到1960年可能已经全部建成，铀金属可能在1961年开始生产。情报部门特别强调铀金属生产是为中国生产钚提供原料，尽管还没有发现中国建造钚生产设施的证据，但是他们怀疑这样的反应堆是可能存在的。他们还认为如果中国每月能够生产30吨铀金属的话，那么到1961年9月将拥有200吨的反应堆，1962年反应堆则全部运行，一年后可为武器试验准备充足的钚。其实美国情报部门已通过卫星照片看到了在兰州有一座与苏联气体扩散厂极为相似的建筑物，并认为它就是为生产铀—235准备的，不过他们预测即使中国还另外建造一组气体扩散厂的话，在1965年以前中国也不可能生产出武器级铀—235。^[6] 到年底在另一份评估报告中，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中国核计划的影响是其重点考虑的因素，认为苏联专家的撤走使铀金属工厂面临困难，而随后的钚生产则更加困难。^[8]

实际上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核计划带来巨大的影响。早在1958年底，由于中国还不具备生产裂变材料的技术基础，因此他们不知道应该设计哪种原子弹，不得不以很高的附加条件为代价，从苏联购买设备，同时建设两条生产线，一条是铀—235生产线，即通过生产铀浓缩获得高浓铀作为装料；另一条是钚生产线，即通过生产反应堆获得钚—239作为装料。苏联停止援建时，铀—235生产线的主要环节——兰州铀浓缩厂已基本建成，设备也比较齐全配套；而钚生产线中的主要环节——生产反应堆工程，则只完成了堆本体的地基开挖和混凝土底板的浇注，后处理厂的工艺线路还有待确定。因此中国为了争取时间，及早获得制造核武器的核装料，1960年4月决定把铀—235生产线作为“一线”工程，作为重点工程全力突击抢建，并加快兰州铀浓缩厂的建设，促其早日投产。而钚生产线则被列为“二线”，暂停建设，加紧科研攻关而不上工程，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建设“一线”工程。^{[1] (pp. 42—43) [2] (pp. 104—105)}

直到中国核试验的前一年，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核装料的选择上仍然十分头疼，根本没有发现中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关于铀—235，情报部门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的主体建筑已接近完成，其附属设施正在建造中。但是当前的建筑只能生产低浓缩

铀—235，如果要生产武器级的铀—235，其建筑主体必须还得增大两倍。他们预测即使这种扩建已经开始，到1966年才能获得武器级的铀—235，如果要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技术困难和所需要的扩建工程，最可能是在1968—1969年；关于钚—239，情报部门则认为包头的钚生产反应堆是一个约30兆瓦的小型空气冷却钚生产反应堆，在设计和建造上具有简易性的巨大优势，对石墨减速剂和铀燃料的纯净要求并不太严格。但是钚反应堆的最大缺点是低生产力，即使包头反应堆全部生产，最多也仅能为一至两个低当量的核武器生产钚。综合上述分析，情报部门认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包括铀—235和钚—239，但是包头生产钚—239的数量要少于兰州生产铀—235的数量，因此认为中国至少可能还要计划建造其他钚生产设施，尽管当前尚未发现这种设施存在的迹象，但是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6] 可见情报部门仍然认为钚—239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首选装料。

1964年8月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核试验迫在眉睫，但仍把重点放在侦察中国的钚—239生产设施上，认为包头反应堆是唯一被确认的生产反应堆，其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可能在1963年或1964年投入使用。^{[5] (c. 365—375)} 其实美国情报部门所认定的包头钚反应堆，确切的来说是核燃料元件厂，该厂始建于1958年，直到1965年才开始投料试生产。当然他们也怀疑其他钚生产反应堆的存在，认为如果存在一定是水冷式生产用反应堆，估计在四川附近。而中国在当时确实还存在着一个反应堆，它就是建于1959年的甘肃酒泉的石墨轻水反应堆，由于苏联撕毁合作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导致反应堆的建设遇到严重的困难，直到1966年才正式建成。^{[1] (p. 204—206)}

总的来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核装料上发生了明显的误判，从而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经过1961年和1962年的艰苦工作，到1962年下半年，中国的铀—235生产线各个环节的技术难关，大多被突破和掌握；整个铀—235生产线的建筑安装工程已经完成了80%以上，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已陆续展开。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离实际制成原子弹仍有一段距离。为尽快进行核试验，经过审慎分析与研讨，1962年9月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提请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1] (pp. 46—47)}

对于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来说，中国进行核试验

是迟早的事情，虽说报告中有许多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时间的预测，但是其时间的意义显然更具有象征性。美国情报部门在第一份对中国核能力的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的时间，最大可能是在1963年，当然也可能晚到1964年或提前到1962年，不过这取决于苏联实际援助的程度。^{[9] (c. 287-312)} 1964年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情报部门虽然不能排除1964年底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其判断认为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内无法获得充足的裂变物质，因此他们预测在1964年底以前不可能进行核试验。^{[9] (c. 287-312)}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美国情报部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是依据其所收集到的所有情报进行综合判断的。然而1964年8月情报部门在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前做的最后一份评估，却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这与他们对核装料发生明显的误判不无关系。一方面从罗布泊核试验场来看，显然中国已经准备就绪，另一方面从核装料来看，他们所认定的钚对于中国立即进行核试验又是不充足的。因此在最后提出报告时不得不把两种情况都罗列了进去。^{[9] (c. 287-312)}

与预测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间相比较，美国情报部门更注意分析核试验对世界的影响。美国情报部门普遍认为核武器能力的获得不可能导致北京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件事情（1）强迫按照自己方式参加裁军会谈和其他国际会议；（2）威慑其邻国并使他们对中国主导下的共产党颠覆态度软化；（3）吹捧中国模式的共产主义，把其作为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和科学现代化的最佳途径。然而情报部门特别强调中国获得有限的核能力不会显著地改变其政策，甚至进行公开的军事入侵。^[9] 确切来说，情报部门在展望未来前景时出言谨慎，而确实核试验并没有预示中国将要大规模生产核武器，更不表明中国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9] (p. 360)} 就连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后来也承认：中国发表的声明与以后的行为是一致的，除了准备应付核攻击以外，中国从没有进行过核威胁，中国的核部署也是有节制的。他还认为：中国时常说要利用自己的核力量为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保护，实际上中国的真正兴趣在于使自己不受核威胁。^{[10] (p. 714)}

三、原子弹的武器化与氢弹的试验

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便开始着手制

订下一步的发展方向。1965年2月3日，二机部向中央呈报《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要加速原子弹武器化，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另一个是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1] (p. 59)}

从已有情报评估来看，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在上述两个目标上的进展情况。一般来说，原子弹武器化主要通过运载工具来实现，运载工具可分为轰炸机和导弹。核航弹是由飞机携带投掷的核武器，它是由核装置、引爆控制系统和包容它们的航弹壳体组成的，与携带它的飞机构成完整的武器系统。情报部门在1962年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相对于核导弹，中国获得轰炸机较为容易。他们估计中国当时拥有325架伊尔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和2架图16中型喷气式轰炸机。不过轻型轰炸机不可能执行运载庞大的核武器的任务，中型轰炸机又很少，因此他们判定中国的运载能力有限。^[8] 随着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他们逐渐改变对中国运载能力的看法，预测在未来两年中国将拥有足够的裂变材料进行试验计划，并能够储备至少几枚原子弹，也能够制造出可由2架图-16中型喷气式轰炸机或约12架图-4轰炸机运载的核航弹。^[9] 实际上中国从1960年就开始对核航弹的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系统进行研究，到中国第一个核装置试验成功时，航弹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改装也已完成，在经过一系列从部件到全弹的各种模拟和实物试验后，于1965年5月14日成功地进行核航弹试投，这也标志着中国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 (pp. 284-287)}

核导弹是由导弹运载的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美国情报部门关注核弹头与导弹结合也是由来已久，从1962年开始的每一份对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国家情报评估中，都着重分析中国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1962年4月他们认为中国首先将部署不携带有核弹头的短程地对地导弹，但是1960年代后半期将在中程导弹上部署核弹头。^[9] 几个月后在另一份评估中，他们又认为如果中国在1963-196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话，那么在1960年代末以前不能把核弹头配置在导弹系统上，如果核试验在1960年代后半期才进行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将在1970年代初实现。^[8] 随着情报部门对中国核导弹的日益关注，他们在分析中国导弹的型号上也越来越具体化，认为中国可能集中在苏联设计的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上，或者是630公里的SS-3导

弹或者是 1020 公里的 SS-4 导弹。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导弹在 1967 年以前将准备部署，考虑到生产与导弹相匹配的弹头所涉及的时间与困难，他们也不认为中国在第一次爆炸后的 3、4 年中能够开发出这种弹头。^[9] 1964 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美国情报部门仍然认为将在 1967 年或 1968 年拥有几枚可以运载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9]

从上述情报评估中可以看到美国低估了中国的核导弹能力。实际上中国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期间，就着手考虑在导弹上配置原子弹头的研究工作。从 1964 年 4 月开始，在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基础上，结合导弹的具体要求，进行了核弹头设计。同时为此做了大量工艺试验、爆轰试验和环境条件试验。最后为了鉴定研制出来的核弹头在飞行状态下的性能，还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全当量、全射程的飞行核试验。1966 年 10 月 27 日，也就是中国核试验的两年后，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风险最大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验。因而促使毛泽东宣告：“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1] (pp. 287—289) [2] (p. 206)} 对于这次核试验，美国情报部门立即做出了反应，在 11 月 3 日的国家情报评估中，他们确认了这次核爆炸。至于其意义他们尚不能断定，认为中国也许是处于政治宣传的目的，使用了尚不能完全适用于武器系统的装备；也许使用一枚加装了核弹头的导弹。他们虽然认为其水平与美苏相比尚有相当距离，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战能力。^[9]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上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美国情报部门最初由于集中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因此并不太重视对其热核武器的分析，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 1960 年代不太可能开发出热核武器。^{[4] [9] [8]} 实际上早在 1960 年 12 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就提出考虑到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正忙于原子弹攻关，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可由原子能所先行一步。1964 年 10 月，在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决定抽出 1/3 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 年 8 月，二机部向中央呈报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一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另一方面要进行若干次核试验，以求通过试验，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提高理论认识。一般来说，热核武器分为两大类型：聚变加强型裂变武器和多级热核武器，从理论上讲多级热核武器要比聚变加强型裂变武器水平更高，更适于配置在导弹上。1965 年 12 月在讨论 1966 年至

1967 年氢弹科研、生产两年规划时，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同意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即一方面按照新的理论方案，以研制由导弹运载的氢弹头作为主攻方向，为此需要相应增加一次新的“热”试验；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原定的氢航弹方案。^{[1] (pp. 276—284)}

1966 年 5 月 9 日，中国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其目的主要是解决热核材料的性能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则理解为中国第三次核试验，效率低，氢弹庞大而笨重，认为中国在热核技术方面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是中国向热核能力迈出的第一步，因此不排除中国在 1970 年代初开发出热核弹头的可能性。^[6] 196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再次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使用了 30—50 万吨当量的铀—锂装置，结果表明按照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情报部门也发现了这次核试验所体现的两级设计概念，体现了技术的进步。^[6] 两次核试验的成功，促使中国决定中止氢航弹的研究试制，集中力量，按照新理论方案进行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速度是最快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取得的成就颇为震惊，从时间上来说，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会这么快就进行了氢弹试验；从技术上来讲，他们对中国的核能力估计不足。

中国在实现原子弹武器化和突破氢弹技术后，决定加速热核弹头的武器化工作。美国情报部门从中国原子弹武器化的经验来看，认为中国迟早要进行热核武器的武器化。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核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美国情报部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革命斗争已经发生在负责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政府部门，聂荣臻也受到了零星的攻击。另一个政治干预迹象是他们发现北京对待第六次核试验带有一种明显“大跃进”式的宣传。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这种狂热和无序继续影响中国，那么对于尖端武器计划的负面影响将始终会存在。^{[5] (c. 487—506)}

值得注意的是从 1965 年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在分析中国尖端武器计划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已不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上，而是着重分析中国的导弹计划（包括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核潜艇计划和太空计划。

四、结 论

回顾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评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在这些评估报告中存在着大量的误判与偏差,不过仅仅通过一些照片和其他不充分的线索对一个国家的核能力进行评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更何况当时中美处于敌对时期,美国获取中国核能力的情报又极为匮乏。所以在评估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大量的模糊字眼,甚至前后矛盾,但是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还是基本勾勒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全貌。其次,从1964年10月16日进行首次核试验,到1966年10月27日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再到1967年6月17日进行的氢弹试

验,中国核计划的发展速度始终是出乎意料的事情,这些惊人的成就是在中国经济相当薄弱和政治制度因文化大革命日趋混乱的情况下取得的,整个社会的动乱似乎未殃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情报部门对这些成就大部分时间免受国内政治动荡的影响颇为迷惑不解,所以在评估时往往是低估了中国的能力。最后,作为最权威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情报评估,在决策者制订对外政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像中国试图进行核试验这样的危机事件,更是决策者仔细阅读并主要依据的文件,而那些非常专业化的关于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文件,则会被纳入到长期的规划过程中,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编辑 付长珍)

注 释:

①2004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解密了一批有关中国的档案文件,这批文件主要涵盖中央情报局对1948—1976年间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的局势、政策、前景进行评估和预测,全套文件共71份,其中直接与中国军事战略相关的就有20份文件。

②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使其发挥大规模杀伤破坏性作用的武器。本文仅讨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

③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原子能出版社,1990年版;詹欣:《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

策(1961—1964)》,《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郝雨凡:《从策划袭击中国核设施看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收入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479页;三船惠美:《瓦解中苏同盟:美国对中国核开发的战略——关于1961—1964年四组中美关系模式的分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7页。

④空军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认为如果中国在1963年爆炸第一个装置的话,那么他们有能力到1960年代末开发和试验热核装置。

参考文献:

[1] 李觉.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 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 中国原子弹的制造 [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1990.

[3] Nuclear Research and Atomic Energy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March 22, 1956. [DB] [2005-10-28], DDRS CK3100407128.

[4] 周均伦主编. 聂荣臻年谱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5] Allen, John, Jr., John Carver, and Tom Elmore, editors.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o Era of Mao, 1948—1976 [G]. Washington, D. C.: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

[6] NIE China Collection [OL]. [2006-03-15]. <http://www.foia.cia.gov/nic-china-collection.asp>.

[7] Kevin C. Ruffner, Editor, Corona: America's First Satellite Program [G], History Staff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1995.

[8] SNIE 13-6-62: Communist Chin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12 December 1962. [OL]. [2006-03-18]. <http://www.foia.gov/docs/DOC-0000628788>.

[9] 约翰·纽豪斯. 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10] 麦乔治·邦迪. 美国核战略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Assessment and Forecast of China's Nuclear Weapon Program (1955—1967)

ZHAN 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From 1955 onward China intended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till 1967 it conducted a the mononuclear test successfully. China made accelerated progress in its nuclear techniques.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ade a clearly wrong judgment on the fissionable material of China's first nuclear test and underestimated China's capabilities of developing the mononuclear weapons, it outlined the Chinese nuclear weapon program on the whole.

Keywords: CIA, nuclear weap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